第 一 章

战略防御阶段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

一、中共的抗战路线与战略方针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1937 年 7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

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为实现其吞并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狂妄计划，日本政府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准备。

进入近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遭到欧美列强的侵略，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的明治政府果断发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推翻了落后的封建幕府制度，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唯一的可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强国。但在倒幕和维新运动中，资产阶级与封建武士改革派结盟，下级武士掌握了政治的主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权，因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仍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天皇制政体和武士道精神，也被新的统治者承袭下来，这对于日本后来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迫切需求。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较晚，国力也相对较弱，其统治层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具有武士道传统的影响，故日本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更多地借助于暴力。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首先指向自己的两个近邻朝鲜和中国。这就是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主要矛头是针对中国大陆，但在日本统治者看来，征服中国须以朝鲜为跳板，于是征服朝鲜便成为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个环节。为了给侵略朝鲜和中国寻找依据，1890 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护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① 山县有朋作为政府首相的施政演说，竟毫不掩饰地将邻国纳入其扩张范围，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的正式形成。

实际上，早在山县有朋侵略理论出笼之前，日本已经开始了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侵略。1874 年，日军出兵侵略中国台湾。次年又开始染指朝鲜。1894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甲午战争，打败清朝军队，并于次年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向清政府索得巨额赔款，并割占台湾。此战的获胜使日本正式跻身于世界列强行列，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因此而急剧膨胀。军国主义分子趁机掀起战争的喧嚣，鼓吹要将“蛰居的日本”变为“世界的日本”“扩张的日本”。从此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就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

①[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 1966 年版，第 197～203 页。

敌人。

1900 年，日本军队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并通过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攫取巨额赔款，取得了在中国心腹地带的驻兵权。

1905 年，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打败沙俄军队，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之后，又将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趁机出兵山东，攻占青岛，控制胶济铁路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地位。

1915 年，日本又利用袁世凯亟欲称帝的心理，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中国提出了极其刻毒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附庸国。日本的侵华政策由参与列强侵华进入了谋求独霸中国的新阶段。

1927 年，田中义一内阁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赤裸裸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军大陆政策最露骨的表述。

《田中奏折》的设想很快付诸实施。1931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的东三省，次年建立伪“满洲国”。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直接占领。 1933 年初，日本开始将侵略魔掌伸进关内，侵吞了热河省。1935 年，日本侵略者又以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方式开始对华北进行渗透和“蚕食”，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条约,不战而攫取了中国华北的大部主权，并策划成立了有亲日派参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就是华北事变。

1936 年 2 月 26 日，日军皇道派军人为夺取政权而发动了流血政变。以此为契机，日本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其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日本的军国主义早在明治维新后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已

形成，其实质是军事立国，实行对外扩张。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完成“昭和维新”。新的法西斯主义与传统的军国主义相融合，便形成了更为好战和更富于冒险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确立后，日本的战争步伐大大加快，全面侵华战争随之进入了具体准备阶段。

首先，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1936 年 8 月五相会议制定的《国策大纲》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① 这实际上是一个吞并东半球的大规模扩张方针。为适应这一方针的需要，新修改的《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规定日本武装力量应扩充到陆军 50 个师团，陆军航空兵 142 个中队，海军主力舰 12 艘、航空母舰 12 艘、其他舰艇 194 艘，海军航空兵 65 队，力求使陆海军实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② 与此相应，日本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直接军费由 1931 年度的 4.61 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 31.2%，骤增至 1936 年度的 10.89 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 47.7%。③ 同时，大力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陆军省在《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力争在五年内制造飞机 1 万架、汽车 10 万辆、生产钢材 1000 万吨。

其次，制定《1937 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并决定增兵华北，强化对华战争准备。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新的对华作战计划规定，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对华北要动用 8 个师团，占领平津地区，必

① [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 1969 年版，第 344～345 页。

② 参见[日]《日本海军史》，教育社 1980 年版，第 167～169 页。

③ [日]《世界各国国防制度》，第一法规出版股份公司 1982 年版，第 418 页。

要时在华北五省同时作战；在华中方面投入 5 个师团,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 对华南,大致动用 1 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海军一开始就要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主要地区。该计划与 1935、1936 年度计划相比，拟定的用兵数量明显增加。二二六事件后不久，日本天皇裕仁亲自批准增兵中国华北，扩编已有的中国驻屯军。扩编后中国驻屯军辖 1 个旅团另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由原来的 1771 人猛增至 5774 人,形成一个诸兵种合成的军事集团。 9 月,日军又先后侵占丰台、通县,并以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保安队占据昌平、顺义等地，从而形成对北平南、东、北三面包围的态势。这说明，日军已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做好了军事准备。

第三，在外交上，同德国法西斯达成反共协定，初步形成国际法西斯主义联盟。1936 年 11 月 25 日,日德双方在柏林缔结《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正式加入国际法西斯阵营，从而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找到了盟友。

日本侵略中国行动的加紧和中日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使中国不得不进行抗战的准备。

为迎接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全党全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针对部分同志对国共合作的怀疑抵触情绪或盲目乐观、松懈麻痹情绪，在全党全军开展了普遍深入的思想教育。各单位、各部队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反复解释党的统战政策、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等问题,纠正各种错误认识,统一思想。

大力扩充红军,开展战术、技术、体育、文化大练兵。到七七事变前夕，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总数达 7.4 万人，还帮助群众建立了“回民抗日军”“江湖抗日游击队”“工人抗日救国会”和“农民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性抗日武装和团体。1937 年 1 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以培养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战干部为目标，加紧和扩大教学工作，同时创办通信、补给、卫生、摩托等专门学校，培训专门人才。到全国抗战爆发时，抗大共培养军政干部 3000 余人。

加强陕甘宁边区建设，巩固抗战后方。中共中央为此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取消原国民党政权颁布的苛捐杂税，保障富农的扩大再生产，对工商业实行保护，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迁驻延安，更方便了对全区的领导。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实行分区剿匪,将苏区内原有的 43 股土匪大部肃清，消除了红军出师抗日的后顾之忧。至七七事变前，陕甘宁苏区已相当巩固，其范围，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邻固原,东到黄河,总面积近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抗战爆发后，这里成为敌后抗战的指导中心和巩固后方。

到 1937 年春夏之交，华北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从 4 月下旬起，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在平津近郊举行战斗演习。进入 6 月，演习更为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 1 联队，竟以攻夺卢沟桥、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一时间，平津一带氛围诡谲，风声鹤唳。日本东京消息灵通的人士私下里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湖一样的事件。”①

驻防冀察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该部辖 4 个步兵师 1 个骑兵师和若干独立旅，总兵力约 10 万人。其中驻守宛平城、卢沟桥一带的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第三营(营长金振中)。

日本侵略者计划中的“第二个柳条湖一样的事件”果然在“七夕的晚上”发生了。7 月 7 日晚 7 时半，驻丰台的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事先未通知中国当局，即荷枪实弹进至中国军队

①[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6 页。

第二十九军防区内的回龙庙、大瓦窑一带，举行挑衅性演习。10 点多，宛平中国守军突然听到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遭到守军拒绝。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一面派兵威胁宛平城，一面派人去丰台请求援兵。20 分钟后，因解手而离队的所谓“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但清水节郎并不报告。8 日凌晨 1 时许，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率援兵赶到现场，并指挥部队占领了宛平城外的沙岗。5 时半左右，日军第 1 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明知失踪士兵已归队，且中日双方正在进行交涉，却下令向宛平城发动攻击。中国守军第二一九团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指挥下奋起反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地区无恶不作。他们随意用刺刀捅死路人；把中国人当活靶，杀人取乐。仅卢沟桥北边一条 30 多米长、7～8米宽、一人多深的沟里，即被弃置了七八百具尸体。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军部和内阁迅速确定了增兵华北、扩大战火的方针。11 日晚，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日军参谋本部下令调遣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和关东军之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增援华北。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决定派陆战队和航空兵到中国青岛和台湾，以配合陆军作战。

由于援兵开抵华北尚需一段时间，日军中国驻屯军于 11 日下午同中方缔结停战协定，以图缓兵。12 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并于 15 日秘密制定了先占平津，再占保定，然后在德(县)石(家庄)线同中国军队决战的计划。

在援兵陆续开抵平津之后，日军于 25 日至 26 日相继挑起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使中日军事冲突进一步扩大。26 日，香月清司向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遭到拒绝。27 日，日军统帅部决定向中国第二次增兵，将国内的精锐部队第五、第六、第十师团派往中国华北。同日，中国驻屯军向北平发动总攻。28 日，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

在南苑作战中壮烈殉国。当晚,宋哲元决定,放弃北平,撤往保定,并留下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与日军周旋。29 日,北平沦陷。同日,日军第五师团进犯天津、大沽,守军张自忠第三十八师展开反击,一度攻占日军占据的天津东站、总站、北宁铁路局和东局子机场,并围攻日军海光寺兵营。后因遭日军陆海空联合攻击,被迫南退静海、马厂。30 日,天津失守。

日军攻占平津后,又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①

从 8 月中旬起,日军投入 30 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大铁路线向华北腹地展开战略进攻。为求得"速战速决",一举摧毁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迅速结束战争,日军又于 8 月 13 日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将战火烧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带华中地区,矛头直指中国首都南京。

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1937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②

① [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资料》第 9 卷,东京 1964 年版,第 17 ~ 18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4 页。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请缨杀敌，表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① 在致第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的电报中，他们要求宋、张等人“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表示红军将士“准备随时出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② 7月14日，中共中央又指派在西安的叶剑英代表中共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③

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蒋介石。宣言以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阐述了国共合作的三大纲领和中共的四项保证。三大纲领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为此必须切实迅速准备与发动民族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首先是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④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谈判。中共方面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国共两

① 《解放》周刊第1卷第10期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等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④ 《解放》周刊第1卷第18期。

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商定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内抗战派及全国人民的积极推动下，蒋介石于 7 月 17 日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指出：“万一真的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此时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表示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对于国共合作仍下不了最后决心，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双方在庐山和南京的谈判也陷入僵局。

但日军从 8 月 13 日开始的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给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动，这意味着不仅卢沟桥事变不可能和平解决，连国民党自己统治的心脏地带也变得岌岌可危了。严峻的形势促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 8 月 14 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① 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也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的步伐也随之加快了。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终于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予以发表。次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申明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性，谈话虽指责中共“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但也承认“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表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愿与中共“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② 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公开发表，标志着由中共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是国内最大的两股政治、军事力量，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基础。尽管国共合作

① 《申报》，1937 年 8 月 15 日。

② 《“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 119 页。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缺乏具体的组织形式和共同承认的政治纲领，但毛泽东还是给予它高度的评价。他在 1937 年 9 月 29 日发表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预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①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不懈努力是主导因素；而国民党的响应与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执政党，掌握着中国的主要政治、经济力量，并拥有 200 万正规军。卢沟桥事变尤其是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改变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和大规模对日作战，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历史证明，在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危急存亡的背景下国共两党有必要也有可能求同存异，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同对敌。

国共合作的建立，使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感到欢欣鼓舞。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兴奋地说：“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② 11 月，她又一次发表声明强调：“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③ 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

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4、365 页。
②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抵抗》三日刊第 12 号，1937 年 9 月 26 日。
③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0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设派等党派均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刚刚出狱的“七君子”和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有感于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毅然决定从反蒋抗日转变为拥蒋抗日。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组成浩荡雄壮的抗日大军。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则踊跃认购救国公债，捐献抗战物资，积极组织厂商内迁，以支持长期抗战。世界各地的爱国侨胞也竭尽所能，支援祖国的抗战。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开始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中国全国抗战，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的爆发，中国人民率先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的全国抗战从一开始就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

抗战初期中国的国际环境

在当时，在国际方面，围绕着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情况如下：

首先是日本及其同盟者。

日本帝国主义是凶恶的侵略者。它坚持实行灭亡全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坚决进行抗战；由于日本是东方的头号强国，又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中国人民要战胜这个侵略者，必须进行持久的艰苦的斗争。

日本的侵华战争得到了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在战争之初，德国由于担心日本侵华可能将中国推向苏联怀抱，也担心日本军队深陷中国战场而失去作为德国盟友的意义，同时也不愿看到日本独占中国而损害德国的在华利益，所以并没有公开赞成日本的战争行动。但随着英德矛盾的逐渐加剧，希特勒为改善德日关系转而开始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1938 年 2 月德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4 月宣布对华军火禁运，5 月下令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德国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盟友。

意大利法西斯从一开始就公开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 年 11 月,意大利正式加入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与德日结成威胁世界和平的法西斯同盟,同月承认了伪“满洲国”。接着,又于 1938 年 2 月开始向日本提供军火,帮助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

其次是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

苏联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其对华政策的重心是援助中国抗战。1937 年 8 月 21 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两国的友好关系。1938 年至 1939 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2.5 亿美元的财政贷款(实际动用 1.73 亿美元),用于中国向苏联购买军火;中国则以稀有金属和农副产品偿还贷款。据苏方统计,中国用上述贷款向苏联购买飞机 1235 架,火炮 1.6 万门,汽车和拖拉机 1850 辆,机关枪 1.8 万挺,子弹 1.8 亿发,炮弹 200 万发,炸弹 3.16 万枚。① 苏联政府还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航空队直接来华参战。其中先后来华的志愿航空队人员达 2000 多人,参加了 20 多次重大战役,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 200 多人为支援抗战在中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世界各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声援中国的抗战,领导和号召本国工人阶级以集会游行、捐款捐物、派人来华等各种方式援助中国人民。朝鲜、美国、印度、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德国等国的共产党员和国际友人纷纷来华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白求恩、柯棣华、史沫特莱、斯诺、希伯、林迈可、马海德、艾黎、罗生特、卡尔逊……他们至今仍受到中国人民的深切缅怀和敬仰。

再次是美英。

① 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外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1 期。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直接损害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在华利益，加剧了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但是，它们在反苏反共和遏制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上与日本又是一致的；而且它们在日本还有着比在中国更大的经济利益。它们一则希望把战争引向苏联以便自己坐山观虎斗；二则害怕中国人民力量的兴起，危害它们的利益；三则忙于应付西方由希特勒引起的紧张局势，力求在东方缓和同日本的矛盾，害怕日本在东方对于它们的攻击。① 因此,在开始一个阶段,它们对中日战争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一方面，它们愿意给中国提供一定的援助，企图借以消耗日本；另一方面又采取绥靖政策，竭力寻求同日本的妥协，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缓和同日本的关系。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在 1937 年 11 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表演。会议并没有作出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任何决定，甚至连对日本的道义谴责都没有作出，反而使日本通过这次会议摸到了英美等国的底牌，因而更加放胆扩大侵略。就在会议结束不久，日本军队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屠杀，30 多万中国军民惨死于屠刀之下。日军还直接向美英发起公开挑衅，炸沉在长江行驶的美舰‘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 3 艘油轮，死亡 3 人，受伤 43 人。直到 1940 年日军公开入侵法属印度支那，日美谈判破裂，美国才开始放弃绥靖政策，改取援华制日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日本势成水火，援华规模迅速扩大，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援助国。

抗战中的两条路线，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与持久战战略方针

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中国，除极少数人投降日本、充当汉奸，成为民族败类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踏上了抗日救亡

①《胡乔木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9 页。

的道路。中国面临的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的问题了。

毛泽东在 1937 年 7 月 23 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有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也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坚持抗战的方针，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在妥协退让的方针下，那就会实行相反的一套办法，即不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人们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实行前一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获得自由解放。如果实行后一套办法，那就不可能坚持抗战，结果必定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做牛马当奴隶的前途。

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积极的抗战态度。1938 年 4 月 1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建议，吸收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对于有关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民众等方面，提出了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如“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奸商垄断居奇”；对于汉奸严行惩办”；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等等。

但是，国民党毕竟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因此它对人民群众怀有很深的疑忌心理，本能地防范人民群众，生怕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会危及其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必然推行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而不去动员人民群众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它不仅拒绝真正的政治改革，不愿意真正改善民生，以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且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千方百计地

予以限制甚至打击。而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结果，极大地制约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力量的发展，并且导致了正面战场的严重失败。很明显，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不仅抗战不容易坚持并赢得胜利，而且还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对内不愿意也不敢于发动人民群众，对外又争取不到及时有力的国际援助，这就是国民党长期对日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实行抗战，一面谋求妥协的基本原因。

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信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信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认为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日本，必须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① 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战争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截然不同的全面抗战路线，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党认为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并得到不同结局的关键所在。

为了制定全面抗战的纲领和政策，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全国抗战的起点，从此开始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使业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② 为此，中国共产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47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324 ～ 325 页。

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①

洛川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种种自由，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4)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5)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互助协定；(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没收汉奸财产，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的生产自给；(7)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赈济灾荒；(8)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对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阐述。它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以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最高利益，同时又把它同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得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即全面抗战的路线；同时，也需要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32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